

唐詩史

下冊

許
總著



(苏)新登字第 003 号

唐 诗 史

(下册)

许 总著

责任编辑 王许林

出版发行: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淮阴新华印刷厂

(淮阴市淮海北路 44 号,邮政编码:223001)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 插页 4 字数 470,400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241—4,220 册

ISBN 7—5343—2100—X

I·89

定价:13.60 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下 册 目 录

第四编

激荡回旋——扭变期

(公元 756—804 年)

绪 言 社会秩序的重创与写实思潮的兴起	(3)
第一章 转折与变创:杜甫的思想与创作	(12)
第一节 紧贴时代的人生历程与心态衍进	(13)
第二节 写实原则的实践与浓烈神情的传导	(28)
第三节 表现功能的新扩展与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41)
第四节 艺术时空关系的重组与律诗美学结构的莫建	(51)
第五节 诗世界的集大成与新开创	(62)
第二章 讽时与复古:元结及《箠中集》诗人	(68)
第一节 写实:社会景观的另一面	(69)
第二节 讽时:批判现实的倾向性	(76)
第三节 复古:政教说倡扬与质朴化表现	(81)
第三章 大历:回旋中的衍进	(88)
第一节 汇聚都城才子与游历江南的逸士	(89)
第二节 暗淡的人生与矛盾的心态	(95)
第三节 昇平气象与精雅诗风的回味	(107)
第四节 质文统一与情景交融的进程	(118)

第四章 贞元：承接中的变异·····	(129)
第一节 时代风尚的多重承受·····	(130)
第二节 审美情调的奇诞变奏·····	(144)
第三节 创作经验的理论概括·····	(153)
结 语 社会思想的深刻性与艺术流程的过渡性·····	(159)

第 五 编

众派争流——繁盛期

(公元 805—859 年)

绪 言 政治图变氛围中的文学革新精神·····	(165)
第一章 诗歌体派的纷呈递现与创作倾向的多源竞变 ·····	(174)
第一节 “元和诗变”的思想内涵与表现特征·····	(175)
第二节 文体革新的深层衍化与多向发展·····	(185)
第三节 诗美创造的变态表现与延展过程·····	(196)
第二章 极端化表现之一：韩孟诗派的创新思想与险怪追 求·····	(207)
第一节 诗人群体组合的时代条件与心理基础·····	(208)
第二节 审美时尚与诗史进程的联结与交汇·····	(214)
第三节 儒释思想的转换与诗文观念的分流·····	(222)
第四节 笔补造化的心性扩张与以文为诗的体格变异 ·····	(236)
第三章 极端化表现之二：元白诗派的功利思想与通俗追 求·····	(249)
第一节 张、王：尚实求俗诗风之先导·····	(250)
第二节 元、白：功利性文学观念的极端化发展·····	(261)
第三节 元、白：通俗化表现形式的大规模实验·····	(277)

第四节	元、白：感伤情怀及诗美表现的另一面	(285)
第五节	通俗诗风的广泛影响	(294)
第四章	哲思与苦闷：刘禹锡、柳宗元的豪情悲慨	(302)
第一节	刘禹锡：雄豪之概与清峻之美	(303)
第二节	柳宗元：酸楚心境与淡泊诗境	(321)
第三节	刘、柳异同：政途同道与诗风异趣	(345)
第五章	瘦影与寒吟：贾岛、姚合的狭小视界	(349)
第一节	走向诗国的时代人生背景	(351)
第二节	寒狭精密的情景意象构织	(358)
第三节	垂范久远的心灵休憩港湾	(367)
第六章	诗律的整密与诗境的拓展：许浑、杜牧、李商隐、 温庭筠等人的唯美倾向	(371)
第一节	抑郁心理与怀旧意绪	(373)
第二节	近体诗律的精熟极境	(386)
第三节	诗境诗风的异态并呈	(396)
第四节	元和体派的偏承与审美形态的变复	(406)
结 语	美的变形与重构	(415)

第 六 编

俗艳余波——衰微期

(公元 860—907 年)

绪 言	末世的衰乱氛围与文人的消沉心态	(421)
第一章	余波之一：指陈时弊与空言明道	(426)
第一节	乱世经历中的忧患意识	(427)
第二节	社会阴暗面的讥讽与揭示	(430)
第三节	政教思想渊源与浅俗表现范式的沿承与发展	(440)

第二章 余波之二：沉湎声色与艳情描绘	(447)
第一节 衰乱时势的洞察与哀挽	(448)
第二节 逸乐时风的折射与追寻	(455)
第三节 轻艳柔婉的体格与风韵	(461)
第三章 余波之三：避世心理与淡漠情境	(468)
第一节 避世隐逸的人生归宿与心理感受	(469)
第二节 淡漠情境的表现及其平庸化趋向	(474)
第三节 艺术品味理论的兴起	(481)
结 语 唐诗审美的蜕变：雄强风骨的衰靡与虚玄神韵的 替兴	(490)

末 编

颓风流衍——五代时期

(公元 908—959 年)

绪 言 总体崩裂的政局与局部偏安的文坛	(497)
第一章 诗坛构成：文人群落与诗体衰敝	(501)
第一节 逸乐生活环境与西蜀文人群落的形成	(501)
第二节 幽微惆怅意绪中的江南文人群落	(504)
第三节 文人性质、文学功能与诗体衰敝	(507)
第二章 文学思想：道德论的虚落与逸乐观的复现	(513)
第一节 治统的紊乱与道统的衰落	(514)
第二节 政教文学观念的虚庸化	(517)
第三节 逸乐观的倡扬及其主情内涵	(520)
第三章 创作倾向：浮艳、冷寂与琐屑程式	(525)
第一节 浮艳诗风与细腻情思	(526)
第二节 散淡情怀与冷寂诗境	(531)
第三节 酬唱师承与琐屑程式	(536)

结 语 唐末之颓衍与宋初之过渡.....	(541)
----------------------	-------

附 录

唐诗发展阶段及大事简表.....	(545)
------------------	-------

主要引用及参考书目.....	(582)
----------------	-------

后 记.....	(599)
----------	-------

第 四 编

激荡回旋——扭变期

(公元 756—804 年)

绪 言

社会秩序的重创与 写实思潮的兴起

唐朝立国至玄宗当政的一百四十年间,由于社会长期安定,经济高度发展,社会财富空前地增加,遂使开元、天宝时代继太宗“贞观之治”之后,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社会最为繁荣的时期,史有“开元盛世”之称。玄宗前期励精图治,政治清明,更造就一代士人昂扬奋发、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风尚。开天文学呈现的浪漫化气息与理想化追求,从本质上讲,正是这一时代条件与文人心态交互作用的结果。

然而,在玄宗后期,兴盛之中已初现衰变端倪,潜隐于社会生活内部的多种矛盾急剧发展,这在天宝年间已经有所暴露。首先,随着封建经济的日益发展,土地兼并亦日益盛行,形成新的豪门显贵集团,政府赋役也是名目多端,许多农民流离失所,使得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社会财富分配的贫富不均,造成豪门贵族生活的穷奢极侈。如杨国忠“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似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踰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撤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①。贵族间竞以进食相尚,“水陆珍

① 《旧唐书》卷五十一《杨贵妃传》。

饘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①。玄宗本人更是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②的淫逸生活，并将政事外者委之李林甫、杨国忠，内者交付宦官高力士。李林甫专权自恣，先后排斥意见不同的大臣张九龄、裴耀卿、李适之等；继之者杨国忠，更是事皆“责成胥吏，贿赂公行”，选官时则于“私第暗定”^③。在这样的情况下，自贞观至开元的开明政治已发生实质性的逆转。正是产生于统治阶级本身的政治腐败，构成了促使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最根本的内在因素。其次，玄宗后期喜好边功，不断发动大规模拓边战争，但因政治腐败、社会矛盾的加剧，这类战争或损失惨重，或直接败绩。如天宝八载，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士卒死伤数万；十载，鲜于仲通攻南诏，大败；同年，高仙芝率兵三万击大食，又大败，士卒死亡略尽；又同年，安禄山率兵六万，攻契丹，亦大败，仅以二十骑逃脱。随着这些代价惨重的边境战争的增多，人民赋税兵役负担愈重，国力亦因之日趋虚耗。再者，土地兼并促使均田制以及建基其上的府兵制遭到彻底破坏，失去土地的农民日益增多，从而使得大量招募兵员戍边成为一项国策，这就初步形成了藩镇畸重与边将擅权的局面。据史籍记载，玄宗时期所置十道节度使拥兵近五十万，数倍于中央禁卫军十二万之数，仅一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即拥有近二十万兵力，且于范阳北筑雄武城，“峙兵积谷”^④、“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己子，及家童校弓矢者百余人，推以恩信，厚其所给，皆感恩竭诚，一以当百”^⑤。返观中央军，“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觝、拔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

② 白居易《长恨歌》。

③ 《旧唐书》卷一百零六《杨国忠传》。

④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安禄山传》。

⑤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

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①。这样，在玄宗后期，不仅唐初朝廷举关中兵足以制四方的优势丧失殆尽，而且已成内轻外重局面，也就无力制止边将的反叛了。此外，当时由于朝政腐败、玄宗昏聩，权臣与边将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倾轧亦愈趋严重，如李林甫为巩固自己禄位，“杜出将入相之源”，以寒族蕃人为将，“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②。蕃将亦尽力排斥汉人，如安禄山在反叛的前一年提升奚、契丹人任将军者五百人，任中郎将者二千人，次年即起兵的当年又以胡将三十二人代汉将，对此，当时朝官韦见素就指出其“今又以蕃代汉，难将作矣”^③。总之，唐朝政治的腐败，国力的虚耗，是社会危机总爆发的最根本的内因；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以及权臣边将之间的权力倾轧，则给野心勃勃的胡族将领以可乘之机；以藩镇畸重、边将擅权与中央武装的空虚为标志的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更为胡将起兵叛唐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因此，从表象上看，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起兵反唐，表现为统治集团内部胡族将领企图夺取李唐政权的战争，但从历史趋势上看，安史之乱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那一特定时代社会矛盾长期蕴蓄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危机总爆发的一种表现形式。

天宝十四载(755)冬十一月，安禄山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以诛杨国忠为名，由范阳起兵南下进攻唐朝，揭开了震撼整个唐代历史的安史之乱的序幕，同时也为自贞观直至开元、天宝一百四十年间逐步发展起来的大唐盛世划上了一个浓重的句号。由于唐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所以安禄山军队在一开始几乎所向披靡，“州县发

①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② 《旧唐书》卷一百零六《李林甫传》。

③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八《韦见素传》。

官铠仗，皆穿朽钝折不可用，持挺斗，弗能抗，吏皆弃城匿，或自杀，不则就擒”^①。于是唐朝赶快募兵，命高仙芝、封常清相继东讨，又命哥舒翰守潼关，高仙芝、封常清相继战败，洛阳失守，安禄山军逼长安。其时虽有郭子仪、李光弼、颜杲卿、颜真卿等远近响应，牵掣叛军兵力，但不久颜杲卿等兵败。天宝十五载(756)五月，哥舒翰兵败潼关，玄宗出走西川，行至马嵬驿，羽林禁军杀死杨国忠，杨贵妃亦被迫缢死。太子李亨逃至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改元至德。于是安禄山军入长安，“大索三日，民间财资尽掠之，府县因株根牵连，勾剥苛急，百姓愈骚”^②。安禄山在攻陷长安之前，就于洛阳称帝，国号大燕，但到至德二载(757)，内部发生分裂，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唐军乘机反攻，又借来回纥兵相助，于是年九月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败退邺城，史思明则暂时投降。乾元元年(758)，唐拟消灭史思明的力量，事泄，史思明杀唐将乌承恩再叛，据魏州与安庆绪遥为声援。唐将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率兵围邺城，史思明带兵来援，大败九节度，又进陷洛阳。史思明既败唐军后，杀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不久，史思明又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因内讧而力量削弱。唐朝再借回纥兵，乘机于代宗宝应元年(762)收复洛阳，并乘胜追击，次年初，史朝义欲奔逃奚族，被部将李怀仙诱杀于范阳城东，安史乱事才告平定。

安史之乱起自天宝十四载(755)冬，至广德元年(763)初平定，前后历时八年。这样长时间大范围的战乱，在中原大地上造成一场空前的浩劫，仅就户口而言，乱前的天宝十三载(754)达九百零六万户，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口，到上元元年(760)仅有二百九十三万

①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安禄山传》。

②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安禄山传》。

三千一百七十四户，一千六百九十九万口^①，七年间人口损失三分之二以上，当时的情形是“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②。对于封建国家中央政权的影响而言，除中原经济的巨大破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一百多年发展稳定的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的创乱，安史之乱反过来又成为整个社会危机的触发点，各种冲突交替喷进一发而不可收拾，最主要的体现是随着封建中央力量日益衰弱，形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边患频仍等内忧外患连续不断的局面。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永贞革新与元和削藩之后方才出现政治相对稳定、经济逐渐复苏的中兴局面。

自安史乱起(755)直至永贞革新(805)之间的五十年，具体可以分为大乱期间、大历、贞元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政治形势与社会状况自有显著不同，但就其实质而言，由于积久的多种矛盾的表面爆发以及深层延续，这一时期显然可以朝廷政治腐败、社会秩序动乱以及国力虚耗、民生凋敝为其贯穿始终的特点。当这样的社会秩序急剧动荡、由盛而衰的巨大转折猛然到来之际，对士人心态无疑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强烈冲激，使得前一阶段那种昂扬高朗的时代精神在“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慌乱氛围中被强力扭变，人生的理想化追求失去了现实的基础，对朝廷的期望与信念亦褪尽了乐观的色彩。

这一时期的诗坛，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折光，成为时代精神扭变

① 见《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按《通典》原文上元元年户数为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唐会要》卷八十四《户口数杂录》作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四十五，均有误。此为据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2册第196页重新核算后的数字。

②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郭子仪传》。

的最为直接、最为迅疾的体现。亲历战乱生活与颠沛流离的诗人，再也唱不出充满浪漫情调的欢歌，走到峰巅极致的理想主义文学终于让位于严酷的现实，形成反映战乱社会与民生疾苦的写实主义创作主流。当然，开天时期的代表作家多有经历安史之乱者，在他们的作品中亦有这方面内容的反映，如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十九“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猛虎行》“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就是直接描写安史战乱之作，但其主观上却认为“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无人，汉道昌”^①，充满“为君谈笑静胡沙”^②的乐观情绪与信念；王维乱后遁入静谧的山水田园之境，在其心理深层实质上是对理想化人格建构的追寻，显然映带着浓厚的开天时代理想主义精神遗存。此外，写实的创作倾向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即以开天诗坛而论，就是以理想与写实的结合为基本特征的，但其写实内涵主要在于实在的亲历场合与创作环境，因此其创作精神核心仍然体现为理想化倾向，写实并不能构成基本的创作法则。随着这一社会历史的重大转折，在文学创作法则上真正褪尽浪漫的理想化光晕，作为由理想向写实转变的鲜明标志，只能以杜甫与元结以及《篋中集》诗人为代表。当然，杜甫与元结等人皆为开天盛世的过来之人，但他们作为开天时代的失意者，又深受儒家正统政治理想与文学观念的浸染，因对政治腐败及社会黑暗面特别敏感，以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甚至在天宝初年就写下不少讥刺时政、暴露黑暗之作，到安史之乱爆发以后，这一倾向更是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因此，杜甫、元结等人虽与开天时代较年轻的一辈诗人年岁正相仿佛，但其创作精神却已截然不同，以写实为核心体现了又一种色调鲜明

① 李白《胡无人》。

② 李白《永王东巡歌》。

的时代性特征。明人胡应麟指出杜甫诗“实与盛唐大别”^①，确具卓识。

从总体上看，创作精神随着时代精神的迅疾扭变，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与社会史发展的惊人的同步，这也就成为反映论文学史观所津津乐道的一个最典型例证。然而，换一个角度看，在与社会史表现出互渗制衡现象的同时，文学史仍然顽强地表现出自律的进程。一方面，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与社会变乱，促使文学创作转向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而另一方面，开天诗坛作为唐前期诗史发展的峰巅状态，积聚着极为丰富的艺术技巧与实践经验有待总结与发展，因此，文学的进程不仅未随政治经济的衰败而消歇，反而以其丰厚的艺术经验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造就出应运而生的面对现实的艺术大师，在另一种意义上表现出文学的更高层次的繁荣与发展。这样的艺术大师便是杜甫。杜甫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整个唐代诗史的流程与走向，而且在艺术上既集前代之大成，又以其创新精神为后世开启无限法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近人胡适在其所著《白话文学史》第十四章中认为，“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而论，最盛之世其实不在这个时期。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由此他明确提出“八世纪下半到九世纪上半(755—850)的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光华灿烂的时期”，“这个时代的创始人与最伟大的代表是杜甫”，元结、顾况是“同道者”，元稹、白居易、张籍、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则“发扬光大了这一时代趋势”。由此可见，杜甫、元结虽然在大历年间即相继辞世，但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思潮的起点，其影响却在后世不断延伸、发展、增殖。

①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

杜甫、元结之后,活跃于大历、贞元时期的主要诗人有以钱起为首的大历十才子与以刘长卿、李嘉祐为代表的江南诗人以及戴叔伦、李益、顾况、韦应物等,还有以皎然为首的活跃于东南地区的诗僧的文学活动及其对诗歌艺术体式的理论概括,在唐诗史后期进程中亦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政治的动荡不宁与经济的凋残衰敝固然构成社会状况的突出表现,但是像安史之乱那样的大动乱毕竟已经平息,统治者还保有一定的实力,因而得以运用各种手段进行调整与自救,如改革漕运、税法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形成一种既动荡不息又渐趋安定的复杂的社会状态。这样的复杂的社会现实通过大历、贞元诗人的亲身经历,在各不相同的个体身上产生各种各样的心态反应,从而造成诗歌创作态度与艺术表现特征初呈多样化趋向。在写实思潮的深刻渗透影响之中,这时期诗人多能面对现实,写出战乱情形与民生苦难;同时,此期诗人又多“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①的写景之作,但却不同于开天时期诗人任运自然的潇洒心态,而是体现为对与自身命运紧密相关的社会现实的着意回避,寻求精神心理的憩息港湾。这样的面对现实与回避现实的矛盾交织,实际上表现了情感活动的内在支配,由此也就造成一种感事写意的创作倾向,但其“情”、“意”的表达,又显然不同于开天时代那样积极进取、昂扬高朗的精神风貌,而是笼罩着一层冷落空寂的情思氛围。从文学传统的角度看,由于开天诗坛丰富多样的创作技巧、艺术经验的成熟以及嗣后以杜甫、元结为代表的创作法则、诗学思潮的转向,大历、贞元诗人面对的是尤为丰厚的艺术遗产,因而往往集更多注意力于艺术表现方式的本身,在创作实践中体现出对多种理想范式的着意回味与努力复现。当然,在已经改变了的时代氛围与创作心态的交互作用的条件下,这样的范式延伸已不可能成为完全的复现,而

① 皎然《诗式》卷四。